

責任編輯：孫嘉萍

一個詩人的歐洲和美洲

李子平

關於約瑟夫·布羅茨基 (Joseph Brodsky, 一九四〇—一九九六) 我想,他對很多詩人來說是個神話。

幾年前接觸,我和朋友都驚嘆他的出色天賦,仰慕他的動人詩篇。但其人對於我來說,有如神秘遙遠的幻象。現如今看他的談話錄其人如坐眼前,情態生動逼真,真是一償夙願。

布羅茨基作為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最年輕的獲得者(八七年,他四十七歲),也許我們會說他得益於英國詩人奧登的直接扶持和幫助,畢竟當年他流亡境外,是奧登接待他並帶他進入歐美詩壇。可我們看到,在詩歌創作上,他自有其卓異能量。他營造詩歌語境和糅合思想並讓其在詩中實現詩性傳達的能力是罕見的。可以說,他是創造了語言與語義結合最佳典範的大詩人。這得益於他先天的敏感和對詩藝的鑽研之深,更主要的是對事物辨析的尖銳深刻——這也跟他動盪的受迫害的生活經歷有關吧。作為一位具有猶太血統的流亡詩人,他流亡前的心靈遭遇多重打擊,流亡後經歷文化、語言和環境的各種變異,以及對故土的懷念、心靈的流落等等,這一切大抵是造就他頗多優秀篇章的因素。再未回到故土的布羅茨基,一直有些難以消解的歷史情結。在他的詩歌中一再體現人世的蒼茫與無力。但他的文字裡始終不乏信念和愛,這一點上,俄國詩人和作家與其他文化國度裡成長的作家詩人存在極大的不同,即來自東正教的傳統信仰,對於上帝和信仰正如其對生命的理解和信念的堅守一樣,他們似乎有消解命運與艱難的存在的非凡能力,除非被過於嚴酷的現實打破信念,譬如葉賽寧和茨維塔耶娃的自殺都具有相近的因素吧。而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卻是一直在宗教的洗禮中,對靈魂進行長期、徹底的反省,使一切存在有了根本的意義。我一直記着布羅茨基的那句詩:人世全部的愛,不如上帝張開的雙臂。

對於布羅茨基,中國詩人總是有著複雜的情緒。敬仰欽佩其創作才華,欣賞讚服其思想的犀利尖銳。但也對他的刻薄敢而遠之。譬如他對中國文化的態度令不少詩人不滿。但我的看法是,作為一位桀驁不馴的詩人,有那樣的憂憤可以理解。當然若只是一味地否定中國文化,我認為這有些不可原諒。但在其中,他說喜歡吃中國菜,又好吃又便宜,我想這還是性情中言,實在的話。

這本談話錄自有其研究價值和學術分量,但也被一些評論者過分拔高,說此書可與《歌德談話錄》與《柏拉圖談話錄》媲美。這是不同的兩個概念,因為就文本內容和被過濾與傳達的有效性來講,前兩者經過後人嚴格選取,摒除隨意的日常性因素,成為嚴格意義的經典話語。此書可以說是一種現場對話的實錄,有很多隨意的成分。但它的意義也不能忽略。此書共十二章,我們從多個方面了解布羅茨基的人生,他的生命成長和詩歌生成背景,他與最敬仰的幾位大詩人的交往:彼得堡故鄉經歷、戰爭、十五歲退學、做工、監禁,繼而流放;茨維塔耶娃對他的影響,他對前者的評價等;關於奧登,其對他的影響和對他的詩歌創作的推動等;關於阿赫瑪托娃,兩人的忘年之交,影響和啟益;關於曼德爾施塔姆、關於弗羅斯特的介紹。還有他的遊歷所到之處,尤其是威尼斯,這個令他傾倒一生,最後遭擄葬於此的地方,在他口中,具有另一種的奇幻之美,是屬於詩人心中聖地,令人嚮往。其次對話的現場感和談話者對事物的直覺判斷與反應,對於心理學、社會學以及詩學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也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

此書是著名文化學家、同樣來自蘇聯的所羅門·沃爾科夫對布羅茨基的訪談記錄,譯者指出,「本書中的每一次回答都是原話,像是錄音記錄,但最終形成的文本經過了『重組』,是多次交談的混合體」。同時這也是一場漫長的談話——跨越了十四個年頭,內容涵蓋詩歌、音樂、芭蕾、政治、歷史、城市等五光十色的文化斷片。編者沃爾科夫在序言裡提示,每一次談話「都構成了一部劇作——都有着開局、潛在的衝突、高潮和結局」。如此,對於喜愛布羅茨基的人來說,不啻為一本感受、懷念、追念大詩人思想、生活、心理脈絡的很好的案頭讀物。

文壇翻案風

安立志

一部中國史,文人可謂「倒幕一族」,先不說秦始皇「焚書坑儒」的開先河,至少從元代的「九儒十丐」起,「臭老九」這頂破帽子,就一直戴到後民國時代。筆桿子是文人的碗筷,舞文弄墨是文人的營生。為了浮名,為了蠅利,文人們或為權勢者搖尾乞憐,或被權勢者咬來嚼去,妙筆生花,信筆走馬,搖唇鼓舌,信口雌黃,多少真相被掩蓋,多少事實被歪曲,多少前人被折騰,多少古書被篡改。正因如此,翻案之風,古今迭起。遠的不說了,「文革」前,有名人為曹操翻案,「文革」後,有文人為潘金蓮翻案,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究其實質也是翻案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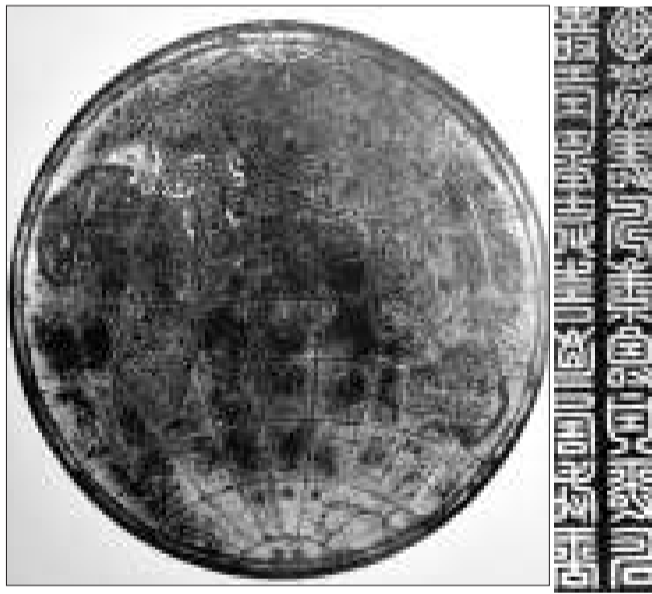
這些人,一些說書學者,借助電視媒體,開了個墓葬書場,古董講壇,大作翻案文章。在這些人的口中或筆下,歷史隨意「戲說」,古人任意「變臉」,古之英雄翻案成了小醜;古之惡棍翻案作了俊傑;古之大儒翻案成了地痞,古之流氓翻案作了雅士,以至於酒池肉林、殘害忠良的老牌暴君商紂王竟然成了一代英主;罪惡昭彰、千古定評的「焚書坑儒」,「坑」的卻是「術士」;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治水英雄大禹竟然有了婚外情;國仇家恨、生逢亂世的著名詞人李清照居然是酒色賭徒。爬梳舊籍,鉤沉發微,發他人所未見,創他人所未知,何其難矣!倘為追名或逐利,顛覆常識,無視定論,任意翻案,何其易哉!只

成員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在沒有預期學術成果,沒有任何獎勵,甚至埋沒姓名的情況下完成的。今天重現這段歷史,才連帶彰顯了他們的貢獻。他們當年甘心默默工作,但我們不能忍看他們默默無名。借此文對參與跟蹤工作的所有同仁,包括國研網和辦公廳的同仁表示一份敬意,致一聲謝意。

四、先進的技術手段和設施,是政策研究機構必需的技術保證。亞洲金融風潮的特點,是其迅猛兇險的發展態勢,有一個國家一夜之間就墮入危機深淵。面對瞬息萬變的局勢,幾乎所有傳統的信息和信息採集手段都顯得滯後,甚至失效。政策研究機構對優質信息的依賴,恰如工廠對優質原料的依存,是政策研究機構的基本實力構成。幸運的是,早在一九九四年中心就開始籌辦自己的局域網,一九九五已建成並投入運行。亞洲金融風潮爆發時,網絡已經成為中心研究的常規手段。網絡普及及多種手段的綜合應用,使中心獨具優勢,保證了第一時間獲得第一手信息。後來,我多次用「網絡第一功」感激國研網的同仁。

這是一塊上好的油煙塊墨,長方形的塊墨色澤黑潤,堅而有光,墨的正面是一幅描金的彩色繪畫,亭台樓閣遠近層次分明,幾個古代仕女神態自然,栩栩如生,整個畫面風雅古樸。

近些年,因為經常往來皖南,我對徽墨略知一二,不似弟弟那般一無所知。丈夫說,這樣的好墨市場價至少五十元人民幣一兩。其實,明清時期較好的徽墨,其價值和銀子的價格相差無幾,極好的徽墨還要超過同等重量的銀子。徽墨製作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徽墨的製作過程相當講究,程序大致可分為:第一是採松。在著名的產松地選取古老的松枝,截成小段,削掉箴刺,讓它發火均勻。第二是造窰。用木板作頂,每兩板相連處,用泥土把它封密,密留有氣孔和取煙的小門。第三是發火。取松枝三五枝作一堆,把它點燃。第四是取煙。等到窰冷了,就可以從小門進去掃煙了。煙分前、中、後三等,後面是最好的,中間的次一等,前邊的最差。煙是越輕越好,古人把分煙的優劣,用手指一按就可以知道。凡是指頭一落煙就飛起的是好煙,因為這證明煙細而輕。第五是和製。要用細絹篩到缸裡,再把煎好的膠和入,加藥料拌勻。然後在鐵臼裡去搗研,搗過以後再放到墨模製墨。第六是入灰。因



胡開文地球墨 (清)

亞洲金融風暴中的DRC

魯志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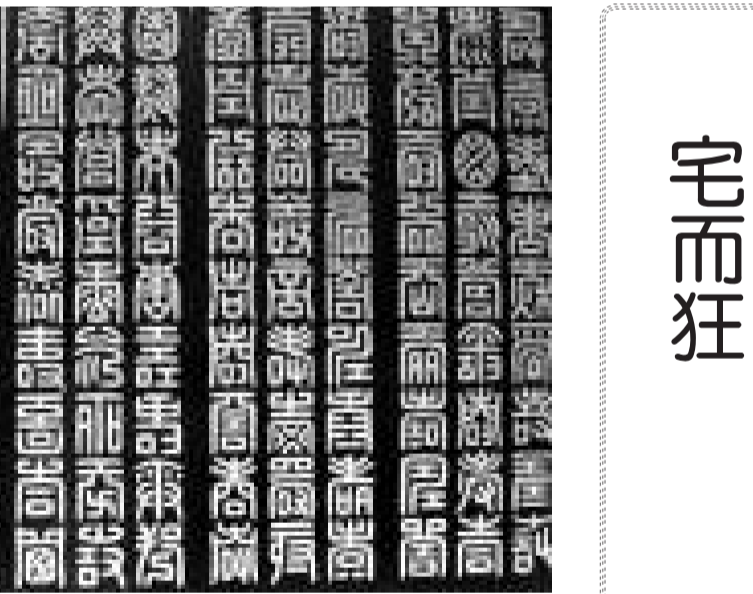
一、領導層的敏感和反應能力,是政策研究機構不可缺少的本能。人們常說「要在正確的時機,用正確的方式,去做正確的事」。道理不錯,但要做到三個「正確」卻不易。對於政策研究機構,要求思維在前,行動在前,三個「正確」更須與不可放棄的理想目標。

二、快速靈活的反應能力和制度保障,是政策研究機構的必備能力。中心跟蹤小組的組織和運作,是一次典型的應急行動。組織精幹,應急團隊,授權實現扁平化管理,調整制度靈活反應,動用各種支撐資源,創新工作模式等等措施,都是有效的應急機制原則。良好的機制將這些原則付諸實施並取得成功,不是源於良好的願望,而是多年日常工作積累的瞬間反應,是深層價值取向和精神文化的具體體現。

三、高水平的成員及職業道德,是政策研究機構的核心競爭力。亞洲金融風潮跟蹤小組能夠達到預期目標,不僅是研究人員嫺熟的業務能力,更是他們的高度使命感和職業道德使然。小組成員,是在沒有預期學術成果,沒有任何獎勵,甚至埋沒姓名的情況下完成的。今天重現這段歷史,才連帶彰顯了他們的貢獻。他們當年甘心默默工作,但我們不能忍看他們默默無名。借此文對參與跟蹤工作的所有同仁,包括國研網和辦公廳的同仁表示一份敬意,致一聲謝意。

宋代的製墨名家潘谷被稱為「墨仙」。潘谷是宋元祐歙縣人,一生製墨,他所製的「松凡」、「撥泥」、「樞廷東閣」、「九子墨」等,被譽為「墨中神品」。這些墨的特點是「香徹肌膚,磨研至盡,而香不散」。蘇東坡和潘谷是同時代的人,因有「翰墨因緣」,曾在《孫志奇墨譜》詩中讚道:「祖徕無老松,易水無良工。/ 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 魚鮑熟萬杵,犀角盤雙龍。/ 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 蓬萊春畫永,三殿明房櫳。/ 金箋濺飛白,瑞霧索長虹。/ 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可見推崇備至。

到了明代,徽墨空前發展,製墨工人激增,文人兼作製墨成為一時的風氣。特別是明朝嘉靖到萬曆年間,由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刺激,引起了製墨業的劇烈競爭;並隨著徽州商業的繁榮,使徽墨傳遍全國,乃至海外。據明末麻三衡的《墨志》記載明代徽州墨工竟達一百二十多家。嘉靖年間的方正、邵格之、羅小華以及萬曆中期的程君房、方於魯、汪春元、葉立卿等,都是在激烈競爭中相繼興起、各樹一幟的代表人物。這時期的製墨特點是「桐油煙」



胡開文八仙壽墨 (清)

中心跟蹤小組影響超出了報告本身,給一些部委以啟示。例如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國務院發展中心主任周正慶,在給證監會各位副主任的批示中寫道:「國務院發展中心金融風潮跟蹤小組的簡報很及時,並引起國務院領導的重視,值得我們學習。證監會也應成立一個專門小組進行跟蹤研究,及時反映。」這一批示從側面證實跟蹤小組實現了「及時」和「重視」兩大目標,也反映了中心應急能力和處置方式得到了廣泛認可。實際上,中央各部委在各自領域裡的研究能力都強於中心,他們能夠從中心工作本身吸取些許營養,等於發生了倍增效應,這個影響也許比跟蹤工作本身更有積極意義。

在我的記憶裡,如此高密度的批示在中心歷史上是少有的,如此高度的評價也是少有的。一個超出當時預想的成果是,原來只想藉機鍛煉一批年輕研究人員,十年後發覺卻是意料之外的豐收。跟蹤小組的成員現在都成為有影響的研究人員,幾乎全部都成為中心等研究機構的骨幹。而跟蹤小組負責人李克穆則被中央調用,現任保監會副主席。

不辱使命。亞洲金融風潮過去十年了,回顧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今天仍能感受當時的震撼,體味其中的慶幸,讀出寶貴的啟示。那段歷史對政策諮詢機構而言,確有李鐵映所說「以謗後事」的作用,至少可以列舉這樣幾點:

「漆煙」被廣泛採用,並加入麝香、冰片、金箔等十幾種貴重原料,不僅質量精良,而墨譜的圖式、墨模的雕刻,也各盡其美,達到歷史上最高水平。如程君房製的「玄元靈氣」墨,董其昌讚賞說:「百年之後,無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之後,無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明代還有一個因愛墨藏墨而終以製墨名世的方瑞生,認為「墨有玄德,有玄才,有玄韻。入水不漬,着手不污,德也;利可裁紙,汁堪入木,才也;墨凝點漆,翳若浮嵐,韻也。合此三者,真堪當友朋,何妨?」方氏是將心愛的墨人格化了,足見愛墨之真切。至清初,製墨傾向於實用美觀,集錦墨和單錠墨盛行。歙縣的曹素功、績溪的汪近聖、歙縣的任節庵以及稍後崛起的胡開文,被稱為清代四大造墨名家。一九一〇年,胡開文精心製作的「蒼佩室」牌「地球墨」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展出並獲金質獎章。歷代製墨人的努力,使徽墨形成了「落紙如漆,色澤黑潤,經久不褪,紙筆不膠,香味濃郁,奉肌膩理」的特點。其中最名貴的是超漆煙等高級油煙墨,這類墨散發出紫光澤,用於書法色澤動而能潤;用於繪畫濃而不滯,淡而不灰,層次分明,受到歷代畫家的推崇。而今,安徽黃山市屯溪區、歙縣兩地為徽墨製造中心。屯溪的老街上有許多家舖在出售徽墨。徽墨在當今仍被作為書寫、繪畫的首選材料,一直處於霸主地位。無論松煙墨、油煙墨,還是漆煙墨,其永保墨色不變。而松煙墨的「墨分六色」功能,一直是國畫(水墨畫)的技藝賴以生存的特定材料。其次,徽墨早在明清時代就步入了工藝品的行列。在方寸間的墨面上,不僅再現了書法、繪畫之作,而且顯示了平雕、浮雕、半圓雕乃至立體雕刻、壓塑等諸種工藝,包涵著各種文化層次,極具觀賞性、紀念性與收藏性。

舊墨歷來被藏家追捧,不僅因為使用舊墨可使書畫作品上的墨跡退除火氣,顯得沉穩而有神韻,還因為舊墨是用許多中藥材製成,可以治療火疔、內出血等病痛。所以,舊墨既可以用作為文房用具,還可以作為一味保健藥物。剛看完了汪修樂所著的《民國教授往事》(河南文藝,二〇〇八)。作者寫了民國時期的二十多位名教授,包括辜鴻銘,劉文典,吳侃,章太炎,顧頌剛,黃炎,錢穆,蘇雪林,陳寅恪,傅斯年,錢玄同,劉半農,朱自清,臺靜農,林徽音,金岳霖,沈從文,王國維,等等。

據作者說,是選取了他們人生中的「精彩片斷」,力求從「獨特的角度」展示他們「與眾不同的一面」和「獨特的人格」。由此可見,這本書大約更偏重「傳奇故事」而不是平實的傳記實錄。但對於一般讀者,這些前人的趣聞逸事還是有很強的可讀性的。

我總結了一下,這些速寫凸現出的相似個性和遭際有以下幾點。一是「狂」,這些人或鑽研古文字,或考證音韻學,都自成一家,所以常常眼高於頂。即使他們不一定都出言狂妄,但內心深處的驕傲都如出一轍。專門研究莊子的劉文典就聲稱,世界上真正懂莊子的只有兩個半人,莊子本人一個,他一個,其餘的人加起來只能算半個。在西南聯大任教時,日機時有空襲,大家得跑警報,劉氏又公然對沈從文說:「我跑是為保存國粹,劉先生你跑是為中國的未來,你跑什麼?」這讓我想起一個中學同學,現在上海某高校任教,研究古典文學。上次我問起他對易中天、于丹的評價,他斷然說:「他們的書不要看」。

第二是,這些教授雖然個性不一,或峻急,或溫厚,或嘮叨,或寡言,但對於自己的專業都非常認真執著。即使在生活方面隨隨便便,毫不講究的,或者性烈如火經常與人吵架「決鬥」的,做起學問來都能耐下性子。這讓我想起聞一多,據說為了研究楚辭,他曾經有幾年的時間「目不窺園」,魯迅也有不逛公園的習慣,號稱「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花在工作上」。用現在的話來說,要成大家,一定得先學做「宅男」,即,足不出戶,離群索居地生活一段時間。坐得冷板凳,才能獲得真本事。我想,最重要的一點還在於他們自己並不以此為苦,反而覺得潛心學術,樂在其中吧。「寂寂寥寥孑子居,歲歲年年一床書。」於繁華中求清冷,方能在平淡中見絢爛吧。

第三是他們的口才並不一定都好。沈從文第一次上課,曾緊張得十五分鐘說不出一句話。顧頌剛口吃。朱自清說話猶猶豫豫吞吞吐吐。錢穆有濃重的方言口音,讓學生理解起來很困難。但這並不影響他們成為後人敬仰的名師,因為他們都是有真學問,真性情的,教育學生也就兢兢業業,絕不馬虎。稱得上是「訥於言,而敏於行」。

第四,他們的運氣都還不錯。這些教授都經歷了中國二十世紀的動盪歷史,一生顛沛流離。可是他們能執教於中國當時的名校,成為萬世師表,往往是因為他們遇到了賞識支持他們的人。錢穆原來是個小學教師,連中學文憑都沒有。沈從文被時人目為「會寫點白話文的小青年」,也沒有受過大學教育。就連大家都視為學術泰斗,通曉十幾種外文的陳寅恪,雖然曾遊學歐美十幾年,也是連碩士學位都拿不出來的。因為學成才,胡適,章太炎等人的栽培,這些今天看來只是「自學成才」的知識分子才能登上發揮自己的舞台。這又讓我想起陳丹青的牢騷。他說,如今考藝術系的有才氣的學生,常常因為英語或政治考試不過關,雖然專業分數高也踏不進高等學府。真是「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啊。

事業是男人的「姿色」

近日,收到一條手機短信:「事業是男人的姿色,姿色是女人的事業。」前半句由我由衷贊成,說得太好了,深得我心;後半句則因其多少有輕視婦女之嫌,儘管不無道理,我有所保留。男人自然也是有姿色之說的,美男子與醜八怪就是兩個極端,多數人則取中間。但男人的姿色,半是父母所賜,半是自己掙來的。放眼看去,那些事業成功的男人,無不神采奕奕,器宇軒昂,臉上充滿自信,嘴角帶著微笑,因為那姿色是來自內心的。從外觀看,他可能也會其貌不揚,可能會五官不整,但是成功的事業會讓他變得滿面春風,笑容盎然。而沒有事業、無所作為的男人,即使長得貌似潘安,那姿色也是慘淡的,眼睛大卻無神,皮膚白卻無光,頭髮多卻無色彩,精緻的五官擋不住內心的空虛,漂亮的臉蛋換不來人們的尊重。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男人沒有事業就等於沒有姿色。女人確實可以靠姿色打天下,有幾分姿色,業就成功了一半,譬如楊貴妃、王昭君們;可男人如果也憑姿色吃飯,那還能夠幹什麼呢,過去叫面首,如今叫情夫、公關,吃香喝辣自不慍慍,可誰能正眼瞧他。昔日武則天養的小白臉張昌宗,得勢時大家都眾星拱月般捧他,說他「臉如蓮花」,一失勢就狗屎不如,連腦袋都沒保住。

男人的事業,一般要到三四十歲才具規模,所以,男人的姿色,最動人時不是二十來歲,而是在而立或不惑之年。成功,你看那些三四十歲的成功男人,你個個臉龐自雄,躊躇滿志,身邊左擁右擁,美女如雲。當然,要說那

男人自然也是有姿色之說的,美男子與醜八怪就是兩個極端,多數人則取中間。但男人的姿色,半是父母所賜,半是自己掙來的。放眼看去,那些事業成功的男人,無不神采奕奕,器宇軒昂,臉上充滿自信,嘴角帶著微笑,因為那姿色是來自內心的。從外觀看,他可能也會其貌不揚,可能會五官不整,但是成功的事業會讓他變得滿面春風,笑容盎然。而沒有事業、無所作為的男人,即使長得貌似潘安,那姿色也是慘淡的,眼睛大卻無神,皮膚白卻無光,頭髮多卻無色彩,精緻的五官擋不住內心的空虛,漂亮的臉蛋換不來人們的尊重。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男人沒有事業就等於沒有姿色。女人確實可以靠姿色打天下,有幾分姿色,業就成功了一半,譬如楊貴妃、王昭君們;可男人如果也憑姿色吃飯,那還能夠幹什麼呢,過去叫面首,如今叫情夫、公關,吃香喝辣自不慍慍,可誰能正眼瞧他。昔日武則天養的小白臉張昌宗,得勢時大家都眾星拱月般捧他,說他「臉如蓮花」,一失勢就狗屎不如,連腦袋都沒保住。

男人的事業,一般要到三四十歲才具規模,所以,男人的姿色,最動人時不是二十來歲,而是在而立或不惑之年。成功,你看那些三四十歲的成功男人,你個個臉龐自雄,躊躇滿志,身邊左擁右擁,美女如雲。當然,要說那



齊人 (清)